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差异

钟雨

黑龙江工业学院, 黑龙江 鸡西 158100

DOI:10.61369/HASS.2025060039

摘要： 18世纪中俄文学作品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分析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文学作品差异的分析能力。文章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切入，剖析了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差异。研究发现，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及文学传统影响，中国作家的创作注重道德教化与社会功用；俄国作家则在启蒙思潮推动下，强调个体价值与人性探索。从作品的主体意识差异方面看，反映出两国文学发展的独特路径，也展现了跨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多元性。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18世纪；中俄文学；创作主体意识

The Difference of Crea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between Chinese and Russian Writers in the 18th Centu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ong Yu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xi, Heilongjiang 158100

Abstract： Chinese and Russian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18th century exhibit distinct differences. By analyzing the crea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authors in these two literary traditions, we can enhance our analytical capabilities regarding such textual disparit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vergence in crea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rough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en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philosophical ideologies,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Chinese writers emphasized moral education and social utility in their works, while Russian authors, driven by Enlightenment ideals, prioritized individual value exploration and human nature investigation. These differences in crea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not only reflect unique developmental paths in the literary evolution of both nations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diversity of literary creation with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8th century; Sino-Russian literature; crea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引言

18世纪是中俄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两国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既受本土文化滋养，又在跨文化碰撞中产生独特表现。通过进一步分析存在的差异，可以深入的理解中俄文学发展脉络，也能够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文学维度的视角，利于全面的分析不同文化语境下中俄文学创作规律。

一、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

在文学创作当中，主体意识相对关键，主要体现为作者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体系构建及身份的自我定位等。这种意识会在构思与呈现等环节呈现，不但能够对作品的思想及艺术效果形成直

接影响，同时还可体现时代的文化基因。作者可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进行审美表达，体现价值观念，由此推动文学作品成为体现历史与个体语境的重要载体。

（一）18世纪中国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

1. 审美意识：传统美学范式的延续与升华

基金项目：2024年黑龙江省省属本科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在华俄侨文学的中国城市书写研究 KY2024072；黑龙江省省属本科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基础研究支持计划”项目：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的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创作对比研究，项目编号：YQJH2023064。

作者简介：钟雨（1995.04.-），女，汉族，黑龙江省鸡西市人，研究生，黑龙江工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俄语。

中国在十八世纪文学创作受到古典美学的影响较深。作家通常会将营造典雅含蓄的意境作为理想的审美价值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袁枚提出“性灵说”,其诗歌语言质朴,韵律雅致,艺术风格更为清逸。纳兰性德的词体现了含蓄美学。词人通常借助江南烟雨等意象,融入自身的相思之苦,形成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意境创造在古典美学当中属于更高水准的境界,尤其在山水诗当中体现明显。王维的“坐看云起时”诗句基于动静结合的画面,在诗歌当中营造自然之美,同时可体现作者的哲思^[1]。

2. 价值观念:儒家伦理的文学实践

此期文学创作广泛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作家通常会将文学作为道德的重要体现。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四大家族的兴衰,通过宝玉、黛玉等人物的命运体现自由人性在封建礼教下的束缚,提倡仁爱等美德。小说当中,秦可卿在王熙凤梦中出现,通过梦境传递居安思危的意识,可见作品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种将创作与社会责任意识结合的价值观,也推动了文学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宣传渠道。

3. 文化身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姿态

十八世纪,我国作家普遍具有传承儒家文化的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起文化维护与推广的重任。桐城派的“义法”理论更强调文章需“言之有物”,主张从《史记》等文学著作中总结创作规则,通过设置严谨的文章体例,规范化的语言风格,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处理西学东渐的冲击期间。文艺工作者也会在创作中引入文学经典,通过编撰《四库全书》等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由此进一步深化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权威地位。

(二) 18世纪俄国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

1. 审美意识:启蒙思潮下的写实转向

在启蒙运动思想的引导下,俄国文学的审美倾向主要体现为理性与写实。在喜剧创作方面,冯维辛作为开创者,其《纨绔少年》通过犀利的笔调对上层贵族的愚昧体现的淋漓尽致。作品主要描述了贵族的日常生活,真实而全面地呈现了奴隶制社会的景象。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表达理性与感性兼具,作品深刻揭露了专制制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由此达到了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较高水平。在文学创作中融入理性精神,也体现出俄国文学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背离。

2. 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文学诉求

作家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也逐渐形成较为明显的批判意识。其通过文学创作推动社会发展。普希金在《自由颂》中较早体现出对沙皇的抨击,热烈赞颂法国革命精神,因此这部作品也被视为俄国文学中最早的民主宣言。文学家们通过塑造恰茨基等典型的贵族形象,深刻体现新兴知识分子反思传统制度的决心和勇气。将自由与社会解放紧密结合的价值观念,也促使文学成为启蒙思想的重要体现^[2]。

3. 文化身份:东西文化碰撞中的探索

俄国文学借鉴西方的文化理念后,也在主动探索具有本民族特征的表达方式。罗蒙诺索夫提出了“三种文体论”,基于欧洲的诗歌格律以及俄语的音节等特征,形成具有本民族风格的诗歌类型。作者们广泛采集歌谣和民族传说,同时融入民间故事等元

素,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融合不但可继续传承俄国的民族文化,同时还可促进俄国文学走向世界。

二、跨文化交际视域下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差异表现

(一) 创作主题的差异

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相对传统的文学范式与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在历史题材作品中,作家普遍倾向于选择往事进行追溯,通过引入古事讽喻现今,体现作者浓厚的家国情思。如洪昇投入十几年的精力创作出《长生殿》,通过叙述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全景式呈现宫廷的奢靡与爱情的悱恻。更将爱情故事放置在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下,从而体现出王朝更迭的历史必然,暗示作者向往的清明社会,揭示荒淫对国运的重要影响。道德教化方面的作品有《镜花缘》等,该作品基于奇幻的海外经历,通过叙述百余名女子的轶事,体现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情节中富含才学与德性并重的理念,让读者在精彩的情节中自然受到道德观念的感染。家庭伦理方面的作品也成为该时期创作的重要内容。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便描述贾府这个封建家族日常生活,全面体现出父子、婆媳等不同人物关系及伦理关系,揭示出封建家族的腐朽本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3]。

同期的俄国文学创作主题课总结为社会现实、个人命运等,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在农奴制的压迫下,黑暗的社会现实成为作者普遍关注的主题,由此作者借助文学作品揭示社会弊病。如冯维辛在《纨绔少年》中刻画了愚昧和荒淫的贵族形象,通过塑造地主斯科季宁的形象辛辣讽刺了农奴主的贪婪本质,引起社会对该制度的深刻思考。从人性探索方面讲,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作者冲出文学创作的藩篱,客观记录旅途见闻,记录了在专制下人性的裂变,从底层人民的苦难写起,更为深刻地对人性的价值进行了探索与思考。在关注个人命运方面,普希金早期的诗歌作品堪称典范。在其诗歌中塑造诸多的叛逆者形象,如《自由颂》强烈批判了专制制度,不但表达了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同时也可体现出个人命运受到的社会冲击,这种无奈也具有更大的震撼力。

(二) 人物塑造的差异

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更侧重塑造相对理想的人物形象,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在“中和之美”和儒家思想的感染下,作家普遍将人物作为道德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古典小说中的义士、才子等形象层出不穷。如罗贯中《三国演义》塑造了关羽等忠义之士。关羽千里走单骑的经历尤为体现出人物的忠义和勇武,因此该形象也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该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虽然能够辅助读者快速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但同时也会对人物的丰富性形成一定的限制,无法在读者头脑中形成更为立体的形象。即便是更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红楼梦》,其中宝玉与黛玉性格的复杂性通常也是通过其叛逆行为体现,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

批判，可服务于主题的深化，而难以从根本上突破形象塑造的樊篱。

俄国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则具有更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其心理活动也更为深入。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俄国作家更加倾向于体现个体价值及人性关怀，侧重刻画具有不同性格及复杂心理的人物形象^[4]。例如，果戈里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并通过波普里辛的内心活动描写更为细致的展现其从清醒到疯狂的变化过程，更为深刻的揭示出社会对人性的荼毒。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多余人形象，不但是文学史当中具有高冷、空虚性格的贵族青年典型，同时也体现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迷茫与无奈，其复杂的性格更为全面和生动的体现出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这种深度挖掘人物的内心，塑造典型化的人格，也提高了俄国人物形象的灵动性，超越了时代的审美价值。

（三）叙事风格的差异

18世纪中国文学在叙事风格方面能够体现出史传文学的明显影响。叙事结构为线性，侧重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该种模式主要源于编年体的史学模式，强调按照时间或逻辑顺序推进故事情节。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虽然结构以类似短篇的形式呈现，但在故事单元中仍然遵照起承转合的叙事规则。作家按照时间顺序讲解不同儒林人物的遭际，如范进中举等情节，同时刻画庄绍光等人物形象，虽然每个故事情节相对独立，但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形成儒林的生态图。这种叙事方式不但能够全面迎合读者的阅读倾向，同时还能读者理解故事情节提供便利，可通过掌握人物命运的变化体现出善恶有报的思想内涵，以此发挥文学作品的引导与教化作用。

18世纪俄国文学的叙事风格相对多样，且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在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背景下，俄国文学形式也实现了创新。俄国作家主动探索应用创新性的叙事手法，运用多视角叙事等参与小说创作，如卡拉姆金小说《可怜的丽莎》便可作为心理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应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更为细致的呈现人物在爱情与现实当中的情感困境和挣扎，带领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从不同视角完成叙事。作者以全知视角对社会做出犀利的评价，或者通过人物对话等体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及命运遭际。灵活的叙事方式不但能够使作品更为立体和生动，同时也可客观呈现社会

以及人性的复杂性，推动俄国文学的创新发展。

（四）文学语言的差异

18世纪中国文学在语言方面也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追求典雅的语言风格，侧重体现韵律的美感。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相对严格的格律要求，倡导诗人要锤字炼句，形成更为规范和华丽的诗歌作品。在此方面，杜甫创作的律诗形式工整，用字考究，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应用精巧的意象组合以及和谐的韵律，体现出诗歌语言的艺术价值。在小说创作方面，作家也普遍应用骈文等元素，由此提高作品的文学性与感染力。例如《西游记》中使用华丽的辞藻描绘仙境等场景。在作品中营造奇幻的情境感。这种追求语言形式的美感不但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要求，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教化与情感表达等功能，促进文学的作品具有更高水平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5]。

俄国文学语言更为简洁，倡导表达的真实性。在启蒙运动理性精神的引导下，俄国作家普遍放弃繁琐的表达方式，尽量提高语言的质朴性。如克雷洛夫创作的寓言故事，语言相对通俗，却揭示出了更为深刻的哲理。《狼和小羊》对话相对简洁，情节紧凑，深刻的揭露出强权霸凌的社会真理，由此具有更为深刻的教育职能。在散文创作方面，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文字更为直白，犀利的揭示出社会的黑暗面貌。如“这里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镣铐……”文字叙述不着雕琢的痕迹，却具有更为强大的感染力。这种语言风格不但能够体现出俄国语法的简单，同时也体现出其词汇的丰富性，客观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切理解和关注。通过文学作品完成自我表达，由此拉近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使作品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6]。

三、结束语

总之，18世纪中俄文学作家创作主体意识存在差异，差异的产生更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种差异体现了中俄两国文学独特的精神内核，也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从实际分析，这些差异体现了跨文化交际中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在今后的研究过程，可以进一步挖掘跨文化因素对创作主体意识形成与演变的深层影响，推动中俄文学比较研究迈向新高度。

参考文献

- [1] 李新梅. 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抑或现实主义? ——中俄学界关于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争论 [J]. 俄罗斯文艺, 2023, (03): 63-74.
- [2] 金雯. 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路径: 18世纪欧洲“仿东方小说”初探 [J]. 国际汉学, 2023, (04): 37-44+155.
- [3] 申前程.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及文化价值 [J]. 汉字文化, 2023, (10): 68-70.
- [4] 吴佳倩. 中俄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对比研究 [J]. 文学教育 (下), 2023, (05): 7-9.
- [5] 李兰宜. 中俄乌托邦文学的精神内涵比较研究 [J]. 文学教育 (上), 2022, (09): 146-148.
- [6] 金雯. 启蒙与情感: 18世纪思想与文学中的“人类科学”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4(01): 2-14+172.